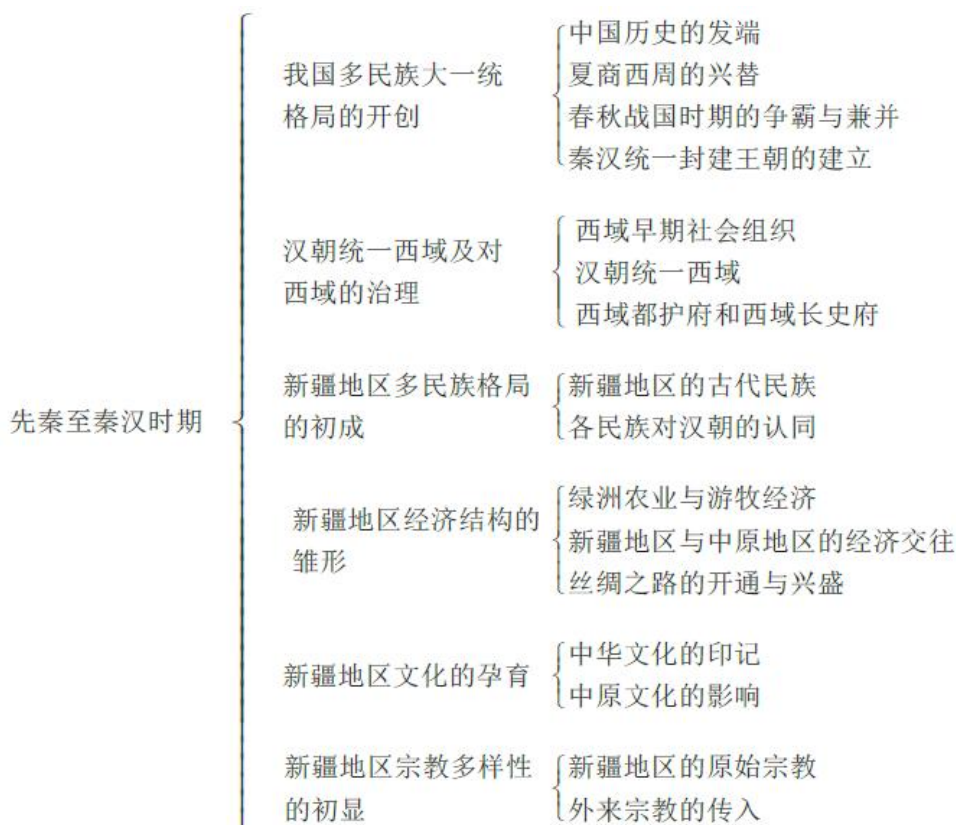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先秦至秦汉时期

## 本章概要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脉，也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随着历史的演进，夏、商、周先后在中原地区兴起，与其周围的大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族群。先秦时期，华夏族群与周围族群多元融合，后来形成为中原人口居多的汉族，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由此奠定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至今已经两千多年。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中，中央政权始终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新疆地区始终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结构图】



## 第一节 我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开创

### 一、中国历史的发端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周边地带分别是高山、大海、大漠和戈壁。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对我国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历史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在中国大地上生息繁衍。黄河流域因气候湿润，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成为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一个地区，是中华民族先民最早聚居的中心，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距今约 6000—5000 年，农耕定居社会共同体在黄河流域等地区星罗棋布，社会经济也由简单的渔猎采集逐步过渡到农耕畜牧阶段，并逐渐酝酿出中华文明早期的萌芽。

距今 5000—4000 年前，中华大地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考古遗存，三皇五帝、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亘古传奇，都勾勒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早期历史画卷。

距今 3800 年前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更为成熟，形成了群星璀璨的邦国文明。历史文献记载，尧舜时期的中国已经呈现“协和万邦”的状态。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华文明进入新纪元，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 二、夏商西周的兴替

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形成、发展并走向兴盛的时期，是中华民族主体初步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华文明日臻繁荣的时期。约公元前 2070 年，夏部族势力逐渐强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夏朝的统治范围，大体西起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南抵湖北，北达河北，中心在今豫西和晋南一带。夏朝建有都城，设有中央行政机构，对地方进行多种形式的管理。夏朝制定的历法，后被称为“夏历”。夏部族与周围东夷、三苗等部族关系密切。夏朝的政治制度开启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

约公元前 1600 年，汤建立商朝。商部族兴起于东方，其势力范围东至大海，西达陕西，北到河北，南抵江汉。商朝前后延续 500 余年，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商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据殷墟卜辞记载，商朝晚期，初步形成了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商朝推行井田制，农业是其主要生产部门。青铜铸造在商朝十分发达，技术水平高超。货币的出现，标志着

商朝商业的发展繁荣。从甲骨文到金文，中国文字体系日臻成熟。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构成了中华文明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鲜明特色。

公元前 1046 年，周朝建立。周部族兴起于我国西北部的泾渭一带，即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区。殷商末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武王起兵灭商，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西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为主的宗法制，诸侯奉“天子”为天下大宗，所以周也称宗周。周朝实行分封制，建立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之间严格的等级臣属关系，形成“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统治格局。西周进一步完善礼仪制度，推动中国成为“礼仪之邦”。

西周时期，夏族、商族、周族经过长期发展，与其周围的大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渐融为一体，形成华夏族群。“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左传》所记载“华夏”，唐代学者孔颖达释为：“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此时的中国，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周朝以中原地区华夏族群为中心，将四周民族称为夷、蛮、戎、狄，统称为“五方之民”，说明这时对民族的认识已经上升为整体概念。“五方之民”中，华夏族群居于核心地位。

###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与兼并

春秋战国时期（前 770—前 221），不论是春秋五霸在“尊王攘夷”旗帜下相互争夺，还是战国七雄为兼并他国而实施的合纵连横，此交彼攻，都推动中国历史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春秋战国既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也是思想、文化、艺术大发展时期。

春秋时期，出现了以齐、晋、宋、秦、楚等为主的诸侯争霸局势。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旗号兼并了十国，秦西向征服了戎狄，晋文公兼并了华夏诸侯小国和北方戎狄所建立的二十余国，楚庄王控制了汉水和长江流域。各霸主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进行了多次兼并战争，最后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它们分别联系着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周边诸族。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合纵”“连横”的战争，其中齐和秦的国力持续增强，势力范围不断拓展，逐步形成区域性的统一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兼并战争连绵不断，人民生活灾难深重，但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了华夷一体的民族意识，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诸子百家心系天下，各抒己见，出现“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四、秦汉统一封建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结束了中原等地区长期以来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刘邦再次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汉朝。秦汉两个统一封建王朝的建立，开创并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政治格局。秦是我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确立的开端。秦统一六国后，取闽越、岭南地，置闽中、桂林、南海、象郡，西北斥逐匈奴、筑长城，其疆域西至甘肃东部，北迄黄河、阴山，东北至辽东，东自大海至今朝鲜半岛北部，南至今越南中部。秦朝实现了“诸夏”的统一，华夏、百越、苗瑶、氐羌等族成为秦之“编户”，疆域内还有许多其他民族。自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族群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居的统一国家。为了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秦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最高统治者“王”改称“皇帝”，嬴政自称“始皇帝”，并希望传之万世，历史上因此称其为秦始皇，皇帝制度也被此后历代王朝所沿用；在中央建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则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从而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制定了适合统一王朝的法律颁行全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文化风俗，修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这些措施消除了各地区制度、文化上的差异，在广阔疆域内实现了有效统治，对巩固统一局面、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了深远影响。

继秦朝短暂的统一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汉代。汉承秦制，经过“文景之治”休养生息，经济繁荣发展，国力大幅提升。汉武帝时期，削弱相权，集中财权，颁行推恩令削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采取巩固边防、拓展疆域的国策。经过北伐匈奴、西通西域、南平百越、西南通西南

夷、东定朝鲜后，汉朝的疆域较秦王朝扩大了将近一倍。

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价值取向。“大一统”观念产生很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已经成为共识，孟子也曾有天下“定于一”的论述。秦始皇刻石颂秦功德，把统一六国视为空前的大业。汉初，公羊学派借助经典，提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武帝顺应时代的需要，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大一统”思想不仅达到了“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高度，其内涵也相应地扩大为万民归心、国家统一。这一思想最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思维观念及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与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华夏族群在秦汉时期的400余年中，与周边其他族群不断交往融合、繁衍生息、成长壮大，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

## 第二节 汉朝统一西域及对西域的治理

### 一、西域早期社会组织

西汉统一西域之前，西域存在着一些大小不一的居民聚落，汉文史籍称之为“西域三十六国”，包括以定居农业为主的“城郭诸国”和以游牧为主的“行国”。这里讲的“城郭诸国”是指在新疆地区南部片片绿洲以及天山、昆仑山的山谷中分布的数十个城郭、聚落。这些绿洲城郭被沙漠戈壁分隔，人数最多的城郭龟兹（今新疆库车、拜城一带），有81 000多人；最小的单桓“国”（今新疆玛纳斯东北），只有27户194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小村庄而已。这里讲的“行国”是指在天山南北的草原上生活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西汉前期，塞人、大月氏（zhī）、乌孙先后游牧于伊犁河流域，阿尔泰山脉还有呼揭等游牧部落。这些“城郭诸国”“行国”都是我国疆域内的地方社会组织形态，都不是“独立国家”。

当时的西域“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后来，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了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向诸城郭征收赋税和财物。西域诸城郭“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zhān）罽（jì），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可见，匈奴虽然控制了西域，但与各“国”的关系较为松散，未能赢得当地各族的信赖。西汉前期，匈奴不断进犯中原地区，给汉朝边郡造成了很大破坏。此时，

西汉正值百废待兴，经济亟须恢复发展，故对匈奴采取了妥协政策。

## 二、汉朝统一西域

西汉经过 60 多年休养生息，至汉武帝刘彻（前 141—前 87 年在位）即位时已府库充盈，国力提升，但仍没有摆脱匈奴的威胁。汉武帝认识到“黄老无为”之策已经无济于事，“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因此，决定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反击匈奴。汉武帝一方面对匈奴进行军事反击，收复河套地区；一方面争取遭受匈奴奴役地区的支持。因此，统一西域与反击匈奴一开始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统一西域，汉武帝决定招募使者出使西域。公元前 138 年，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接受联络与匈奴有旧仇的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使命。张骞率众自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西行途中被匈奴拘禁，10 余年后方得逃脱。张骞继续履行使命，西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行经大宛（yuān，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抵达已迁居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阿姆河两岸的大月氏境内，但此时的大月氏已无意东返，张骞于是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公元前 126 年，张骞回到长安。张骞的第一次西域之行，前后历时 13 年，克服路途艰险及被匈奴阻隔等重重困难，足迹西达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张骞的出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打通了中原地区与西域联系的孔道，因此被称为“凿空”。通过张骞沿途见闻，汉武帝首次了解到西域的详实情况，确立了对西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构想。由此，汉武帝加速了统一西域的步伐。

张骞出使西域期间，西汉反击匈奴的战事也于公元前 133 年的马邑之役正式开启。其后，西汉于公元前 127 年至公元前 119 年，派卫青、霍去病先后三次出兵重创匈奴，并在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河西走廊上陆续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切断了匈奴同西北氏、羌诸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中原等地与西域各民族间的往来。

匈奴遭受一系列沉重打击后，主力向西北远徙，西域成为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公元前 119 年，西汉为进一步联络乌孙，以“断匈奴右臂”，派遣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此时河西走廊地区已经畅通无阻，张骞顺利到达乌孙，但当时乌孙内乱，无暇他顾。张骞于是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今中亚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大夏（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身毒

（今印度）等国。这些国家多派使节随汉使来到长安，与汉朝建立了联系，而乌孙王也派使者随张骞到汉朝了解情况。乌孙使者从中原地区返回之后，向乌孙王报告了汉朝的辽阔富庶，乌孙“乃益重汉”，并请求与汉和亲。自公元前 105 年起，汉武帝先后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重要力量。公元前 102 年，汉派兵征服姑师（后称车师，姑师范围包括今罗布泊以东，北至乌鲁木齐、奇台、吉木萨尔一带）、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控制了西域门户，后又降服时常与汉朝作对的大宛，巩固了张骞凿空西域的成果，将汉朝的政治影响向西延伸到中亚地区。这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极大提高了汉朝在西域各城郭中的威望，各城郭纷纷归附汉朝。

公元前 71 年，汉朝派常惠出使乌孙，征调乌孙兵配合汉军进攻匈奴，大获全胜，匈奴从此日渐衰退。在常惠、解忧公主及其侍女冯嫫的努力下，乌孙最终成为中央政权管辖的属部。

公元前 60 年，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chán）率众降汉，受封归德侯。自此，西汉完全统一西域。同年，西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自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都护是汉朝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级别相当于中原最高一级地方长官——郡太守。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此以后，历代中央政权都将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西域的管辖权。

西汉末年，外戚专权，王莽篡政自立为帝，建国号“新”。王莽“托古改制”，不仅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社会危机。匈奴乘虚而入，以武力胁迫“敛税重刻”西域诸城郭，致使西域陷入动荡不安。

公元 25 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自建武（25—57）至于延光（122—125），西域三绝三通”，反映了东汉统一西域、西域各族人民始终心向汉朝的曲折历程。

东汉建立之初，西域诸城郭饱受匈奴苛敛赋税和战乱之苦，“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多次遣使贡献，请求东汉依照西汉旧制派遣西域都护管理。但此时中原地区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社会动荡未宁，人民生活困苦，光武帝无暇西顾，西域只能屈服于匈奴的统治。

29 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依照西汉制度，以朝廷名义封莎车王康为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五国皆属焉”。38 年，莎车王贤派人与鄯善使臣同往洛阳朝贡，中原地区与西域再次建立了政治联系。汉明帝时期（58—75），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统治业已巩固，社会趋于稳定，此时的匈奴已分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又逐步控制了西域。东汉决定“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恢复对西域的管辖。

73 年，东汉出击匈奴，攻占伊吾卢（今新疆哈密），设立宜禾都尉以屯田，又派假司马班超率勇士 36 人出使西域，先后降服鄯善、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地。74 年，窦固、耿忠击降车（jū）师，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以陈睦为都护，又设戊己校尉，以耿恭为戊校尉，屯驻车师后部金满城（今新疆吉木萨尔）；以关宠为己校尉，屯驻车师前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鲁克沁镇）。东汉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

91 年，汉朝大败北匈奴后，东汉重设西域都护府，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它乾城（今新疆新和西南）；任命徐幹为长史，驻疏勒；设戊己校尉屯驻车师前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又置戊部侯，居车师后部侯城（今新疆奇台境内）。94 年，西域各城郭全部内属，东汉再次统一西域。97 年，班超以东汉名义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条支（今叙利亚）、波斯湾，“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102 年，班超返回洛阳。班超的出使及都护西域，不仅加强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而且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班超的继任者施政不当，引起西域诸多城郭不满，北匈奴残部趁机占据伊吾（今新疆哈密），入寇河西边境。123 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任命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屯驻柳中。经过几年努力，到 127 年，班勇主要依靠西域城郭的力量，逐步击退匈奴势力，再次统一了西域。

汉朝统一西域，使西域诸城郭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为西域创造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新疆地区各民族“不乐匈奴”而“慕汉”，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观开始深入新疆地区各民族心中。每当汉朝不在西域设置都护、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的时候，西域诸地无不热切向往中原，希望能重开玉门关、阳关，恢复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这充分反映了边疆各族



人民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对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有着深远影响。

### 三、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府

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府是汉朝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机构。汉朝通过在西域设立机构、委派官员、册封地方首领以及驻兵屯田等，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管理体系。

设官置守。公元前 101 年，西汉设使者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朝设在西域最早的地方官员；公元前 60 年设西域都护府；公元前 48 年设立戊己校尉，专管西域屯田汉军，由朝廷直接任命，受西域都护节制。西汉在西域建立了由西域都护领导、西域副校尉协助、戊己校尉管理屯田戍卒、受朝廷册封任命的各城郭首领管理各地的军政管理体系。东汉沿袭了西汉旧制，并在东汉后期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管理西域的职权。西域都护府或西域长史府的管辖范围涵盖天山南北、帕米尔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军事方面，西域都护或西域长史统领驻西域的军队，并在奏请朝廷批准后，可调遣西域各城郭的军队，以保卫地方安宁。在民政方面，西域诸城郭必须服从西域都护或西域长史管理，执行都护的政令。

为改变西域“无所统一”的政治局面，汉朝采取灵活的治边之策，保留了各城郭的组织结构，各级首领由朝廷任命，各城郭的官吏均由朝廷授予金印紫绶或铜印墨绶。西域诸城郭“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1953 年出土于新疆新和县的“汉归义羌长”铜印，就是汉朝中央政权颁发给某支羌人部落首领的官印。汉朝通过授予印绶的方式，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作为地方官员行使权力，从而将西域诸城郭首领纳入汉王朝的职官体系之中。

屯田戍防。戊己校尉统帅的屯田部队是汉朝西域驻军的主力。为了减轻西域各族人民的负担，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草供应，汉朝在西域实行屯田制度。公元前 105 年，汉武帝派军队到今新疆伊犁河谷一带屯田，这是我国古代中央政权在西域屯田的开端。由于屯田在统一西域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汉朝对屯田作用的认识也不不断深化，屯田成为汉朝统一和治理西域的重要举措。公元前 60 年，西汉统一西域后，屯田规模进一步扩大。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

遗址的司禾府印，印证了东汉在尼雅一带屯田并设有专司屯田事务机构的史实。屯田戍卒亦兵亦农，亦耕亦战，既为军队提供了粮草，保障了军队的战斗力，也未给当地百姓增加供给负担，还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传播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屯田戍边从此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治理西域的千古良策。

绘制舆图，统计人口。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后，诸城郭内属，“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汉书》和《后汉书》中的《西域传》都详细记载了西域各城郭的地理、人口等情况，说明汉朝对西域的地理和人口情况进行过统一调查和记录。西汉在渠犂屯田时，“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说明当时也绘制有地图。

进贡物品，忠诚汉室。汉朝在西域实行以贡代赋，西域诸城郭以进贡物品的方式，来代替其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义务。凡西域诸城郭前来朝贡，朝廷必有赏赐，且赏赐物品价值往往超过贡物价值。西域诸城郭为了表达对汉朝的忠诚和对中原文化的仰慕，将王子送往朝廷学习先进的典章制度，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文化交流。

修筑城垒烽燧，保障交通。西域是东西方陆上交通枢纽，确保道路畅通十分重要。汉朝把设官建置、驻兵屯守与确保交通相结合，构筑城垒，疏通道路，修建烽燧列亭，与延伸到罗布泊的汉代长城相互呼应，在重要路段设卡稽查，保障道路畅通。位于今新疆拜城县黑英山的东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诵”石刻中，记述了刘平国将军带领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等 6 名秦人（即汉人）和一些羌人将士在这里凿岩筑亭、修建关隘和稽查过往行人商旅的事迹。

汉朝对西域的管辖，为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 第三节 新疆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初成

#### 一、新疆地区的古代民族

新疆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迁徙聚居的地区。先秦

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龟兹人、焉耆人、于阗人、疏勒人、莎车人、楼兰人、车师人、匈奴人、汉人等最早开发了新疆地区。

塞人曾经广泛分布在欧亚草原。公元前 7 世纪末之前，部分塞人部落已经迁徙到伊犁河、楚河流域。公元前 177 年前后，塞人遭西迁大月氏驱逐，一部分退到锡尔河北岸，一部分散处于帕米尔高原及以南地区，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

月氏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公元前 3 世纪末，月氏臻于强盛，曾迫使蒙古高原上的匈奴称臣纳质，势力涵盖了蒙古高原西部至阿尔泰山地区、河西走廊西部和天山东端。公元前 177 年前后，匈奴大举兴兵攻破月氏，月氏经天山北麓西迁到伊犁河、楚河流域，逐走塞人而居其地，史称“大月氏”，留居祁连山的余众称“小月氏”。约公元前 130 年前后，匈奴支持河西走廊西部的乌孙远征大月氏。乌孙西迁伊犁河，击败大月氏，占据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大月氏从伊犁河流域西迁进入阿姆河流域，征服阿姆河两岸的大夏国，立王庭于河之北岸。

乌孙是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的部落。乌孙因历史旧怨远征大月氏，占据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在吸纳当地众多游牧部落后，乌孙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成为西域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部落。

羌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原居于陕西羌水，后来一部分向东迁徙，较早地融入华夏族群；一部分留在原地或向西迁徙，主要分布在河湟、陇南至川西北、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带。在塔里木盆地东南缘、南缘至帕米尔高原的山谷中，都分布着一些羌人部落。汉代西域诸城郭中，有一些是羌人所建，如婼羌、西夜等。汉朝统一西域后，羌人各部诸城郭，都归属西域都护府管辖。

匈奴是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后来征服了楼兰（后更名为鄯善）、乌孙、呼揭（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南麓）及西域其他城郭。公元前 51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亲率诸部首领来到长安觐见**汉宣帝**，匈奴正式成为汉朝的属部。

当时新疆地区的汉人主要是戍边官吏、军卒、屯田戍卒、商人等。他们肩负着管理和稳定西域的重任，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西域都护府或西域长史府等军政机关以及地方各部门任职。自公元前 105 年起，汉朝就相继在伊犁河谷、轮台、尉犁屯田，后来扩大到全疆各地。汉朝统一西域后，东西交通畅通，加之朝廷对戍

边人员的优惠政策，进入新疆地区的汉人连续不断，日益增多。至西汉末年，已经形成汉人遍布新疆各地的大分散和各屯田点小集中的格局。

此外，以天山为界，天山南部聚居生活着很多城郭农耕居民，其大致分布为：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自东而西，有婞羌、鄯善、且末、精绝（今新疆民丰）、扞弥、于阗、皮山、莎车等；沿塔里木盆地北缘自西而东，有疏勒、姑墨（今新疆阿克苏）、龟兹、乌垒、尉犁、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车师等；在天山北麓有东蒲类、西蒲类、东且弥、西且弥等；在帕米尔南部有蒲犁，北部有休循、捐毒等。

## 二、各民族对汉朝的认同

历史上，新疆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始终和中华民族关系演变相联系。各民族有隔阂冲突更有交流融合，团结凝聚、共同奋进始终是主流。西汉在河西四郡移民屯垦，拓展了中原诸民族与新疆地区各民族互动的范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

西汉前期，匈奴对西域进行残酷压迫与剥削，史载“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西汉统一西域后，改变了匈奴以往的苛政，通过免征赋税、提供各种物资、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等方式，扩大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

王莽时期，匈奴借机卷土重来，对西域诸族的压迫变本加厉。西汉末东汉初，匈奴在西域“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面对艰难处境，以莎车为代表的众多城郭，对汉朝中央政权仍守志不易，不愿投附匈奴。其后，各城郭首领不断派使者入关，甚至“流涕稽首”，恳求东汉中央政权派出都护。

76年，驻守疏勒的班超奉旨东返，行至于阗，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班超见状深受感动，决定留下，并返回疏勒，与当地人民一起打败了反叛者，使疏勒重归于汉。在安定南道大多数城郭过程中，班超感受到了当地人心归汉的强大力量，于是在给汉章帝的奏书中称：“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随后，班超带领当地各族，先后平定莎车叛乱，击败大月氏，收复焉耆等地，使西域北道诸城郭主动归服。

## 第四节 新疆地区经济结构的雏形

### 一、绿洲农业与游牧经济

新疆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活动。新疆和布克赛尔县和什托洛盖骆驼石遗址发现的砍砸器和手镐等表明，在距今三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疆地区北部就已经有人群在从事狩猎、采集活动。距今 4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遍布天山南北，以七角井和阿斯塔那为代表的文化，延续着以狩猎为主、兼营采集的原始生活。距今 4000 年左右，青铜工具在新疆地区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使用。人们因地制宜，从事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哈密盆地以农业经济为主，罗布泊小河遗址所在地农牧并举，天山北部和帕米尔高原以畜牧经济为主。在距今 3800 年左右的罗布泊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干尸，头戴尖顶毡帽，身裹毛毯，足穿皮鞋，反映出当时的罗布泊地区已有畜牧业、家庭手工业。距今 3 000 年前后到公元 3 世纪，伴随着阶级分化，天山南北先民的社会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罗布泊、和田、哈密、伊犁等地都出土了这一时期的彩陶器。战国、汉代的遗址中存在着彩陶器和铁器共存的现象。分布在天山南北的文化遗存，如察吾乎、焉布拉克、苏贝希和伊犁河流域等遗址表明，新疆地区与周边经济交流频繁，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秦汉之际，已有很多部落、部族在各地游牧、聚居、繁衍生息。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新疆地区的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作物有五谷、葡萄、苜蓿等，人们定居在城镇和村庄，如塔里木盆地周围的鄯善、戎卢、扞弥、于阗、莎车、疏勒、渠犂、焉耆、龟兹、姑墨以及吐鲁番盆地的车师，葱岭西北的大宛等；另一类以畜牧业生产为主，逐水草而迁徙，如在天山以北的乌孙、乌揭、车师后国，帕米尔高原的蒲犂、西夜等，昆仑山北麓的婼羌等。“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焉耆“近海水多鱼”。

汉朝统一西域后，在新疆地区开展大规模屯田与水利设施建设，减轻了当地的经济负担，得到了各民族积极支持。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为新疆地区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屯田开发。汉朝之所以能够对西域进行有效管理，与屯田密不可分。这一时期的屯田以汉人军卒为主体，也有其他民族参与。西域屯田的兴盛，带动了当地农业迅速发展。在实施屯田的地方，物产十分丰富，粮食作物有小麦、粟、黍、

高粱、青稞、豆类，果蔬有葡萄、石榴、胡桃（核桃）、胡萝卜、蒜，还有棉花、桑等作物。新疆地区的栽培技术和特产传入中原地区，密切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

水利建设。新疆地区干旱少雨，水利建设对保障农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考古发现新疆地区汉代水利遗址有多处：今沙雅县境内有一条汉渠遗迹，长达 100 多公里，宽达 8 米，深 2 米，已具相当规模；在若羌县的米兰遗址中，至今保存有比较完整的汉代水利灌溉系统。该系统从米兰河引水为总干渠，下分七条支渠。这样规模较大、工程复杂、技术水平较高的农业水利建设，是人口稀少的绿洲城郭无法做到的。当时参与米兰河引水工程建设的除河西兵外，还有“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该工程使许多瘠土变为良田，灌溉土地面积约 4.5 万亩，其中农耕土地 1.7 万亩，不到三年就收获粟百万石。

畜牧业生产。公元前 10 世纪以前，新疆地区就有了原始畜牧业。今伊犁河谷、天山山谷、阿尔泰山南麓和额尔齐斯河上游，以及巴里坤草原的广阔地带，都分布着丰美的草场。汉代塞人、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等先后在这里游牧。

冶铁与手工业。新疆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汉朝初期就有许多地方产铁。嵯美“山有铁，自作兵”，姑墨“出铜、铁、雌黄”，目前，在新疆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主要有三处：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了铁矿石、矿渣、铁斧、铁铲、石凿等；洛浦县阿其克山遗址发现了土烧结铁和陶鼓风；库车县阿艾山遗址出土了小坩埚、铁渣、矿石和陶瓠（鼓风管道）等。以上遗址都有汉代五铢钱出土，说明这些冶矿场所都是汉朝统一西域后兴办的。先秦时期，新疆地区就有了以毛绒纤维为原料的纺织手工业，汉代又有了新的发展，毛纺织品不仅数量多，花色品种多，而且工艺水平高。毛纺织品中主要有褐、罽、毛罗、毛毯等。从出土的遗物来看，有的十分精美，说明当时毛纺织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而在民丰一座东汉时期合葬墓中出土的蓝白印花布残片，表明东汉时新疆地区已使用棉布，或者已有棉纺织业。民丰县尼雅遗址、洛浦县山普拉墓地不仅出土了大量的毛织品，还出土了与纺织品有关的工具。在天山以南地区，木器生产也成为一个重要行业，木器主要为食器等。木器的传统制作方法是用刀进行掏、刮、削，而在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了用回旋切削法制成的木器，说明在汉代已经有了旋木工艺，开始用简单的机械来加工生活用品。同样，汉代新疆地区也出现了轮制陶器。在伊犁地区晚

期乌孙墓中出土的陶器，大多是轮制，与手工制陶相比，陶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

## 二、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

早在先秦时期，新疆地区就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流传至今的《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大量有关西域人文、地理、物产等方面的记载、传说，与中原地区墓葬中出土的新疆玉制作的陪葬品相互印证，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远古时期新疆地区和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壮丽画卷。考古资料表明，哈密天山北路发现的彩陶器大多源于中原地区，并逐步由东向西发展。乌鲁木齐南山矿区以及阿拉沟等地墓葬里还陆续出土了一些中原地区输入的漆器、丝绸以及铜镜等物品，这些都表明史前时期新疆地区就与中原等地保持着密切联系。先秦时期新疆各地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后来西汉统一西域奠定了一定基础。

汉朝统一西域后，随着社会日趋稳定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各民族社会活动的地域空间也不断扩大，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输入新疆地区，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新疆地区不少特产传入中原等地，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

除水利灌溉设施外，中原地区的打井技术也传入西域，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公元前 104 年至前 101 年间，李广利征伐大宛，围其城，并切断水源，但大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这里的“秦人”即指汉人。显然，大宛的穿井之术就是汉军士卒中的水工带到新疆及中亚地区的。

铁犁铧是汉代中原地区农业生产中十分重要的工具。两汉之前，新疆地区已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但生产技术较为落后。在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哈密五堡、木垒四道沟等遗址中，曾出土过石、木、青铜等材质的农具，但未见犁铧类工具的出土，这表明新疆地区在汉代以前尚未使用铁犁牛耕。在新疆地区屯田的汉军将当时先进的铁制农具生产技术带来后，使过去普遍使用木制耒耜作为农具的各地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在伊犁河谷的昭苏夏台等乌孙或塞人的土墩墓葬中，在孔雀河下游的营盘墓地中，都曾出土了与关中长安等地所出土的汉代大小形制相同的铁犁铧。由此可见，犁耕技术在汉代已传入新疆地区。

铸铁技术在新疆地区普遍推广使用。据《史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又据《汉书》载，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围困时，熟知西域情况的陈汤曾对汉成帝言：“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可见，在汉代，中原地区铸铁技术传入新疆地区后已被广泛使用，使当地农业生产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的商业交流活动比较频繁，传入新疆地区的商品主要有丝织品、铜镜、漆器、木器等，其中以丝织品为大宗。在洛浦山普拉古墓葬、尼雅遗址、楼兰等地都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同时也出土了大量铜镜、漆器和木梳等。商业活动的活跃，带动了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众多商业小城镇的兴起，推动了新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疏勒出现了专门的商品交换市场“市列”，于阗流通一种“汉佉二体钱”钱币，即正面为篆体汉文，背面为佉卢文。这些都体现了各民族在经济方面的广泛交流。

盛产于新疆地区的葡萄、苜蓿已经在中原地区广泛栽培，胡麻、胡桃、胡豆（蚕豆）、胡蒜（大蒜）、胡萝卜、石榴等由新疆地区陆续传入中原，而中原地区的杏、桃等水果也传入新疆地区。此外，新疆地区输入中原地区的商品还有牲畜、畜产品、药材、玉石制品等，这些商品传入后，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西域以盛产良马而著称，汉武帝初以乌孙马为“天马”，得大宛马以后，又以大宛马为“天马”，以乌孙马为“西极马”。大量良马输入中原地区后，对改良汉代的马种起了很大作用，并带动了养马业的迅速发展。

### 三、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兴盛

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原与新疆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双方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使中原通往新疆地区和欧亚各国的道路更加通畅。此路始发长安，向西经过河西走廊，再西则分为两条：一条向西北，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此为北道；另一条向西南，出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此为南道。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汉朝出使安息、奄蔡、犁靬、条支、身



毒等国的使者，一年中多达十几批，少则五六批。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国也派遣使者与汉往来。一时诸国“莫不献方奇”，于是“异物内流则国用饶”，丝绸之路沿线呈现出“使者相望于道”的繁华景象。

汉代以后，丝绸之路内涵更加丰富。经这条道路运往西方的商品有丝织品、漆器、铁器等，西方输入中国的商品有良马、橐驼、香料、石榴等。随着东西方交流的不断深入，以绿洲、草原和海上干线为主的网状交通系统逐渐形成，并在唐代达到鼎盛。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古老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中亚文明在这里交会碰撞，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交融。

## 第五节 新疆地区文化的孕育

### 一、中华文化的印记

彩陶文化的西传。彩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早在距今 6 000 多年以前，黄河流域的农业地区就产生了彩陶文化。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从渭水流域向西，传播到甘青河曲之地，由黄河上游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地区东部天山盆地、河谷、绿洲，环博格达山地区，天山南麓一线，伊犁河谷，勾勒出了史前时期“彩陶之路”。考古资料表明，今哈密市天山北路古墓地及其他地区出土的陶器大多源于东方系统，如双耳菱格纹彩陶罐就是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典型器物；陶器上流行的垂带纹、网格纹、手形纹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陶器接近。可见，早在距今 4 000 年前，马厂和四坝这两种甘肃早期文化已经扎根新疆地区东部的哈密，并逐步由东向西发展。

玉石东传。中国玉文化历史悠久，从原始社会开始，玉器就是人们心目中的祥瑞之物。随着人类审美观念的产生和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以玉制作的各类器物成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礼仪、商贸乃至社会生活和审美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 3200 年左右的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发掘出玉器 756 件，经过检测基本上是新和田玉。这说明早在商朝时期，新疆地区和中原等地区的人们便通过玉石彼此联系。

丝绸西去。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丝织文明。发明养蚕和织造丝绸的技艺，是古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居

民就会饲养家蚕并织造丝织品。随着丝绸生产技艺的提升和机具的进步,到了商、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丝绸生产和贸易已进入成熟和繁荣阶段。新疆乌鲁木齐阿拉沟古墓出土的春秋时期一件凤鸟纹刺绣,以及俄罗斯境内戈尔诺阿尔泰省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凤鸟纹刺绣,均来自于中原地区,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物已经传到新疆地区并及于更多的地方。

汉代丝织业已采用了经车、纬车、织机等先进器具,可生产出平纹、单色提花、彩色提花等种类的产品。新疆地区发现的大量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尤以尼雅、楼兰遗存为多,主要包括“元和元年”鹿纹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锦、“登高明望四海”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长乐明光”锦等,这些织品与汉代丝绸纹饰类型一致。新疆尉犁县营盘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汉代的织物、服饰。这些物品鲜艳如新、种类繁多,有绢、纱、绮、绫、锦、刺绣以及染缬(xié)、贴金等,几乎囊括了当时丝绸的所有品种。研究证明,这些丝绸主要来自中原等地区。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色彩绚烂,祥鸟、瑞兽、白虎走动于云气、星际之间,纹样独特,寓意祥瑞。这件精美的织锦,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五星”指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中国”泛指当时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五星出东方”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于东方。这种天象非常罕见,一般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出现一次,所以引起古人的好奇与重视,认为是“天意”,预示国家五谷丰登,繁荣昌盛。

## 二、中原文化的影响

汉语成为西域官府文书通用语。秦朝建立后,为了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国家政策法规的推行,统一了文字,以“秦篆”(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西汉统一西域后,汉语文成为西域官方通用语,得到广泛传播。西域各城郭中,都设有“译长”一职,负责汉语与当地语言互译。保存至今的今新疆拜城县黑英山东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诵”石刻,刻于东汉永寿四年(158),全文均用汉字写成,反映出汉语在龟兹的流行。尼雅遗址出土了精绝国使用的汉文读本“仓颉篇”简文,残留文字与中原地区的课本“仓颉篇”一致。在精绝王宫发现

过王室成员间应酬赠礼的汉文“木简”，说明汉朝曾派出老师对精绝王室及统治阶层进行过汉语文教育，而他们已可熟练使用汉文彼此沟通。

新疆地区出土了不少西汉早期的半两钱和汉代各个时期的五铢钱，甚至还有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三种流通货币。于阗出土了大量的“汉佉二体钱”，又称“和阗马钱”。其正面用篆体汉文标明币重，大钱作“重廿四铢铜钱”，小钱作“六铢钱”；背面以佉卢文标明于阗王姓名、年号，铸造年代可追溯到2世纪。由此可见，汉文在新疆地区已广泛流行。

礼仪制度对新疆地区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仪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着政治交往和民间交流传入新疆地区。公元前105年，应乌孙请求，汉武帝封江都王刘建之女为细君公主，将其嫁给乌孙王。细君公主出嫁时，汉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从而将中原的典章制度、礼仪文化带到了新疆地区。龟兹王绛宾迎娶解忧公主之女弟史后，于公元前65年偕夫人入朝，被赐予印绶。龟兹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这里的“汉衣服制度”，是汉高祖时依照夏商周三代礼仪制度而制定的，即《周礼》《仪礼》《礼记》记载的冠服体系。而“汉家仪”则是汉代的官方礼仪制度。尼雅遗址出土的精绝王夫妇合葬墓，墓主面部覆盖锦质面衣，为中原礼俗。从龟兹王、精绝王崇尚效仿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可以看出中原典章制度文化对新疆地区的影响之大。

音乐舞蹈在新疆地区的广泛传播。乐舞互动是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个显著特点。秦汉时期中原音乐歌舞对新疆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时，汉武帝“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细君公主将中原地区的乐器琵琶带到新疆地区，加强了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的音乐交流。解忧公主与乌孙王所生的长女弟史喜爱中原音乐，解忧公主专门派弟史“至京师学鼓琴”，弟史与龟兹王绛宾结为夫妇后再度来朝，等他们即将返回龟兹时，汉宣帝特意“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同时，新疆地区音乐因曲调激昂婉转、节奏韵律强而受到中原地区人民的喜爱，有的还成为中原王朝的宫廷音乐。据《西京杂记》记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这说明早在汉高祖

时，于阗乐就已传入长安，成为皇家乐队演奏的必备曲目之一。

秦汉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确立，中华大一统思想理念的形成，受益于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成功治理和大一统思想的浸润，新疆地区呈现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特质，并展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

## 第六节 新疆地区宗教多样性的初显

### 一、新疆地区的原始宗教

在古代新疆地区存在自然崇拜现象。当时的人们相信万物皆有灵魂，相信超自然力量，认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大自然。为了获得大自然的恩赐，人们便对日月山川、风雨雷电等一切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产生崇拜。在罗布泊发现了一处氏族社会的墓葬，在墓地地表周围立有七圈环列木桩，圈外是呈放射状四向展开的列木，其状恰如一轮华光四射的巨日，表现了当时的罗布人对太阳的崇拜。在新疆富蕴县唐巴勒洞中，有一幅彩绘岩画，上部是两个同心圆，分别代表日、月，旁绘彩云，下部是一个形状怪异的人头像。类似反映日月崇拜的岩画，在新疆多地都有发现。

新疆地区的原始居民也崇拜动植物。古罗布人崇拜麻黄草和小麦，死后要把这两种植物随葬。小河墓地的遗存则反映出当地以狩猎和游牧为生的居民多崇拜动物。

图腾崇拜在新疆地区也十分盛行。古代新疆地区有以虎、豹、狮子、狼、骆驼等为图腾的部族，也有以太阳、树木等为图腾的部族。当人们粗知生殖的道理后，就开始了对生殖的崇拜。新疆特克斯县乌孙山的阿克塔斯洞穴和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形象地记载了新疆地区古代居民对生殖的崇拜。

祖先崇拜是生殖崇拜的延续，也是华夏族最重要的崇拜。《国语·鲁语》中记载：“有虞氏禘（dì）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gǔn）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郊、祖、宗四字都是祭祀的名称，禘、郊用以祭远古的皇祖，而祖与宗则以祭祀直系的祖先，后来“祖宗”成为祖先的一般称呼。帝颛顼时，发生了“绝地天通”的原始宗教变革。《尚书·孔氏传》记载：“帝命羲、和，世

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绝地天通”的实质意义是天地相分，人神不扰、各得其所，人于其间建立固定的纲纪秩序，人心得以矫正，礼制得以确立。

新疆地区居民的祖先崇拜集中表现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上。匈奴人每年有两次重大的祭祀集会，祭祖先、天地和鬼神。“其送死，有棺槨（guǒ） 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新疆地区古代各游牧部落的丧葬仪式虽有所不同，但信仰灵魂不死、崇拜祖先亡灵的宗教观念却是一致的，他们相信祖先的灵魂能够庇护子孙、保佑部落。

原始宗教进入晚期阶段后，出现原始宗教的高级形式——萨满教。“萨满”在满-通古斯语中指神职人员，即汉语中的“巫”。其基本特点是信仰萨满具有超自然异能，能够与精灵直接沟通。萨满主持氏族部落的宗教活动，祈求氏族神灵保佑本氏族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为氏族成员祈儿求女、占卜吉凶、治病消灾等。

## 二、外来宗教的传入

新疆地区位于亚洲腹地，不仅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要道，也是东西方宗教传播的通道。

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祆教是最早传入新疆地区的外来宗教。祆教俗称“拜火教”，宣扬善恶二元论，以火为善与光明的象征，有专门祭祀圣火的仪式。考古资料和研究结果表明，两汉时期，生活在天山山区、伊犁河流域的塞人，以及天山以南的于阗人、疏勒人、莎车人等都信仰祆教。后来，祆教经新疆地区传入中原，影响较大。

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了佛教，此后佛教开始向周边传播。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佛教先后传入于阗、疏勒。此后，佛教又沿着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传播到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个绿洲。佛教传入新疆地区后，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推广，信者日众，并在各地迅速传播开来。后来佛教逐渐取代萨满教、祆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

中国传统宗教理念和中庸辩证的思想，为各种宗教在新疆地区的发展、传播和交流创造了条件。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特点也决

定了新疆地区宗教的多元性。

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外来宗教的传入，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的宗教在形态上存在多样性、地域性和延续性的特点。袄教传入后，各地仍有流行已久的各种自然崇拜、萨满崇拜。随着佛教的盛行，各地王室、贵族大都崇奉佛教。信仰佛教的大月氏人多次向汉朝遣使奉献。64 年，汉明帝派人前往西域，并请一些僧人到内地。67 年，汉明帝专门为此修建了寺院，命名为白马寺。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座佛教寺院。从此，佛教便在中原地区逐渐传播开来。

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宗教演变，奠定了此后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的基础，也促使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宗教产生紧密联系。